

·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财政支援项目 ·

韩国文学论纲

赵东一摇徐大锡

[韩] 李慧淳摇金大幸摇著
朴熙秉摇吴世荣

曹南铉

[中] 周摇彪摇刘钻扩摇译

[韩] 全弘哲摇主审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前 言	(1)
-----------	-------

一 概论

(一) 韩国文学的范围与领域	(3)
(二) 韩国文学史的展开	(6)
(三) 韩国文学的特性	(13)
(四) 韩国文学的研究成果	(16)
(五) 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19)

二 口碑文学

(一) 绪论	(25)
(二) 说话	(28)
(三) 民谣	(50)
(四) 巫歌	(61)
(五) “盘骚里”	(73)
(六) 民俗剧	(80)
(七) 结论	(86)

三 汉文学

(一) 绪论	(93)
(二) 抒情汉诗	(95)
(三) 叙事汉诗	(106)
(四) 散文的形态	(113)
(五) 开化期的汉文学	(130)
(六) 结论	(134)

四 古典诗歌

(一) 绪论	(141)
(二) 上古诗歌及乡歌	(144)
(三) 高丽歌谣	(151)
(四) 乐章	(157)
(五) 时调	(159)
(六) 歌辞	(170)
(七) 结论	(178)

五 古典散文

(一) 绪论	(185)
(二) 韩文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189)
(三) “盘骚里”类小说	(202)
(四) 家族小说	(208)
(五) 小说以外的散文文学	(215)
(六) 结论	(220)

六 近代诗歌

(一) 绪论	(229)
(二) 开化期的诗歌	(231)
(三) 20 世纪 20 年代的诗歌	(237)
(四)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诗歌	(247)
(五) 光复以后的诗歌	(259)
(六) 结论	(275)

七 近代散文

(一) 绪论	(281)
--------------	-------

(二) 开化期散文的形态	(283)
(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	(289)
(四) 光复以后的小说	(304)
(五) 戏剧	(311)
(六) 批评、随笔及其他散文	(316)
(七) 结论	(325)

前摇摇言

本书是为学习韩国文化的在校大学生编写的全面理解韩国文学的入门书,尽管与以往出版的很多韩国文学概论著述意图并无太大不同,但体系大相径庭。迄今为止的著作多是讨论晦涩难懂的概念或说明杂乱无章的事实,因而一开始就使读者失去了兴趣。本书的出发点则是通俗易懂、亲切有趣。本书的写作目的并非只是解释作品,而是通过阅读韩国文学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以个人的感受和体会为基础,分析讨论作品的重点问题,通过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韩国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本书一改韩国文学概论只论述国文古典文学的错误惯例,综合考察、全面分析了韩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并且概论部分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本书虽然是大学教材的内容,但如果你想在高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或者希望重新全面理解韩国文学,相信本书应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作为大学教材、高中参考书还是一般读者的修养书籍,本书都将有助于你消除障碍,提高文学素养。

本书的编著者赵东一、徐大锡、李慧淳、金大幸、朴熙秉、吴世荣和曹南铉等都是汉城大学的同学,他们所学专业不同,研究方向和方法也不一样,可以互为补充。这是本书的一大长处。七人分工如下:赵东一:概论;徐大锡:口碑文学;李慧淳:汉文学;金大幸:古典诗歌;朴熙秉:古典散文;吴世荣:近代诗歌;曹南铉:近代散文。在促进国文学研究

方面,大家通过各自的工作发挥着积极和主导的作用。我们把分析和整理整个研究动向看做是非常重要的的一环并采取共同合作的方式,制定了周密的写作计划,在取材范围、内容构成、执笔要领等方面采取了统一的方针,将完成的初稿轮流审阅,互相批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本书在韩国大学被作为教材广泛应用的同时,也正被翻译成几种外语版本。其中,中文版是最先问世的。它由中国山东师范大学的周彪和刘钻扩两位老师翻译,韩国又石大学的全弘哲老师主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真是可喜可贺!上述三位老师都博学多才、才华出众。他们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怀着满腔的热情,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本书的编译工作。

在中国,学习韩国文化的学生日益增多,我经常听到学生们抱怨没有一本适当的入门书。我希望学生们能充分利用本教材,激发兴趣,轻松入门,同时扩大视野、丰富知识。我还希望学生们能在学习过程中,对比中韩文学界在理解和评价文学的视角上的不同,充分领略韩国文化的丰富多彩!

本书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出版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赵东一

圆年 员月

一 摇概摇论

（一）韩国文学的范围与领域

韩国文学是指韩国作家以韩国读者为对象用韩国语创作的文学。韩民族从未与其他民族混居过，民族特色十分鲜明。因此，分辨作家和读者是否是韩国人非常容易。韩国的语言是统一的单一语言，使用韩民族的语言——韩国语的文学便是韩国文学。

韩国称得上是没有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最大国家。在这一点上，韩国与中国、日本不同。韩国文学是民族国家文学的典范。通过韩国文学史可以寻找到民族国家文学形成、发展的典型轨迹。虽然在日本殖民地统治期间，韩国人一度失去了祖国，但他们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并使韩国文学持续发展。

如今朝鲜半岛虽然分裂为南北两国，但两国共同继承着悠久的文化遗产，文学的基本形态也没有什么差别。两国在语言和文学上存在的差异，仅局限于两国在政治观念或体制上的差异。移民到中国东北或中亚等地区的海外韩国人也在用韩国语进行文学创作，所以广义上的韩国文学应包括他们的文学。

韩国文学始于口碑文学。口碑文学延续到现在，一直为书面文学起辅助作用。朝鲜半岛接受中国的汉文而出现汉文学以后，韩国文学的范畴得以扩大。韩国人先是用汉字来标记韩国语，后来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从而使国文文学得到了稳定的发展。韩国文学就是由口碑文学、汉文学以及国文文学这三种文学组成，而韩国文学史就是这三种文学相辅相成发展而来的历史。

文学的基本要素不是文字而是语言，因此，韩国的口碑文学也应该是韩国文学。对这一点，韩国文学史界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最终达成了共识。国文系照例讲授口碑文学，并在口碑文学的调查和研究上倾注了很多精力。民谣、巫歌、说话等悠久而丰富的口碑文学遗产至今仍被广为流传，而且假面舞或说唱文学的价值也

在不断得到新的评价。此外,今天的诗歌创作中有人还试图恢复对民谣的创作。

汉文学是用汉文写成的文学,因此似乎可以说它不是韩国文学。但是,作为文言文的汉文是东亚许多民族共同使用的书面语。在这一点上,它是与拉丁语、古典阿拉伯语以及梵语是相同的。而另一方面,汉文又不同于上述三种共用书面语。在不同的国家,汉文的发音及读法都不一样。用韩国语音并加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韩国语助词来读的韩国的汉文是韩国语的书面语。韩国的汉文中,有的甚至吸收了韩国语特有的语法或词汇,从而变得更加韩国化。

韩国的汉文学是韩国人作家以韩国人的生活为内容,以韩国读者为对象而创作的,它作为韩国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了口碑文学,力求反映民众生活,并且从未停止过要把汉文学发展为民族文学的努力。即使在那些照搬中国文学的形式或者表现方法的汉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韩国汉文学所特有的趣味。^①

韩国语记录文学起始于利用汉字来标记韩国语。自从接受并广泛使用汉字以后,韩国人就发明了利用汉字来标记韩国语的乡札标记法。乡札标记法与越南的“字喃”大同小异,也曾对日本“假名”的形成发生过影响。但是后来这三种标记法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日本至今沿用简化汉字笔画而成的表音文字——“假名”,越南则舍弃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字喃”文字,最终选择了罗马文字,而韩国则在 15 世纪创造了一种叫做“训民正音”的独特的

^① 关于这一点,云梯(1980)在“韩国语记录文学”中(《韩国语记录文学》,韩国语记录文学研究会编,韩国语记录文学研究会,1980)进行了考察。专攻中国文学的法国学者将《东文选》中的汉诗与唐诗比较,发现韩国的汉诗表现了民族自豪感,赞美国土美丽,经常使用人称代词,很多作品具有诙谐的特征。

文字。

韩国语音节结构复杂,很难用汉字来标记。所以乡札标记法没能得到广泛的利用。准确地表现韩国语的优秀文字——“训民正音”出现以后,韩国的国文文学才得以充分的发展。不过,国文文学与口碑文学以及汉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必须经过一段必要的过程。国文文学可谓是以口碑文学为母体,以汉文学为父体而产生的结晶。这是因为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口碑文学的表现方式和汉文学的思想,并把二者合二为一。

不仅韩国文学,属于汉文学圈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也由口碑文学、汉文学以及国文文学组成。属于梵语圈、古典阿拉伯语圈和拉丁语圈的许多国家也各自存在着口碑文学、共用文文学以及国文文学。不过,在韩国特别重视口碑文学、汉文学和国文文学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原因。在韩国,这三种文学占有一样的比重,各自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叙述韩国文学史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如果与属于汉文学圈的其他国家相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与韩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在中国,汉文学占绝对比重,在日本是国文文学占绝对比重,而在越南,口碑文学起到特别突出的作用。中国是汉文学的发祥地,因此汉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便于大众使用的文字,所以相当于韩国国文文学的白话文学发展得非常缓慢。日本因为没有实施以汉文学能力为评价标准来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所以使用汉文的文人并不多,汉文学也不发达。相反,国文文学很早就发展起来,并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风范。在越南,由于“字喃”标记法直接依赖于汉字,很难广泛使用,所以国文文学没有得到顺利发展。然而越南人特别重视口碑文学并积极地利用它。用“字喃”文字创作的作品虽没能作为读物广泛流通,但却通过口传的方式得以流传,并被作为整个民族的古典作品加以利用。

在韩国,口碑文学、汉文学以及国文文学这三者中没有哪一个

独占鳌头,都占有同样的比重。它们既相互争奇斗艳,又互相吸引对方,并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汉文学积极吸收口碑文学,赞扬民族英雄的斗争,歌颂韩国的历史和风俗,而且把饶有趣味的故事加以作品化,从而成为韩国特有的文学。国文文学对口碑文学中形成的诗歌形式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积极的再创造,每当国文诗歌需要革新的时候,就从口碑诗歌中吸收必要的成分并加以创新。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于是就产生了时调和歌辞,时调又分化出辞说时调。此外,国文诗歌力求具备不亚于汉文诗的品格和思想的努力也从未间断过。

口碑文学、汉文学以及国文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来之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上、下层文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统治阶级认为有必要理解被统治阶级的处境,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以便缓和社会矛盾,于是就让汉文学接近口碑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有必要对民众采取教化和治理双管齐下的方法,于是就创造了“训民正音”,并试图在国文文学中形成一种有效的道德教化方法。国文小说之所以突出表现“劝善惩恶”这一主题,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广大的民众并不认为身分区别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就出现了反抗统治阶级特权的讽刺文学。他们吸收了统治阶层文学的表现方法并加以口语化,构筑了违背统治阶层意愿的国文文学世界。这样,国文文学中形成了教训和讽刺等多种方式进行竞争的格局。

(二) 韩国文学史的展开

口碑文学、汉文学和国文文学之间并没有始终保持同等的关

系,而是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关系。^①正是这一点给我们提供了能够对文学史进行时代划分的根据。尽管在韩国文学史的时代划分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如果把口碑文学、汉文学和国文文学之间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划分标准的话,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结果。

韩国古代之初只有口碑文学。在公元前后吸收了汉文,并在缘世纪前正式形成了汉文学,从此也就由古代进入了中世纪。中世纪是汉文学的时代。可以说,中世纪文学一直持续到汉文学衰退为止。不过,汉文学是与国文文学共存的。韩国人一开始就通过乡札标记法来创作国文文学,后来又创造了直接标记韩国语的“训民正音”并利用它培育了国文文学。缘世纪以后,国文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达到了与汉文学相抗衡的地步。从此也就进入了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期。

近代汉文学衰退以后,国文文学一枝独秀。缘缘年的“甲午更张”废除了科举制度,把国文作为共用文字,这对近代文学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韩民族是单一民族,韩国语的方言差别又很小,因此能够顺利完成统一民族语言并加以标准化,从而振兴近代民族文学的任务。汉文和国文的区别在于一个为书面语,而另一个则为口语。因为国文本身并不存在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所以一旦抛弃汉文而只使用国文,就能够实现言文一致。

划分韩国文学史时代的第二个标准为文学形态。口碑文学、汉文学和国文文学提供了各具特色的文学形态,给文学史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开始了各种文学形态互相竞争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化,各种文学形态相互交替,从而导致文学体系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一过程进行整理和考察的话,就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文学的发展历史。

^① 从现在开始展开说明的韩国文学史是以赵东一的《韩国文学通史》全五卷(汉城,知识产业社,第三版,缘缘年为依据的。

在古代口碑文学时代,以建国英雄为主人公的建国叙事诗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建国叙事诗本身虽然已经消失,但其痕迹却依稀可见。叙述神奇的建国历程的建国神话概要以汉文形式记载于有关文献流传至今。另外,在国家的祭祀活动中歌颂英雄斗争的形式后来演变为叙事巫歌。把这两者加起来考察的话,就能够看出建国叙事诗的样子。

随着汉文学的到来,抒情诗替代叙事诗并开始起主导作用。堪称汉文学精华的汉文诗是一种精练、简洁的抒情诗,国文文学也把它当做了最重要的领域。乡歌采用民谣的韵律,用与汉文诗不同的方式加以提炼,后来发展成为蕴含深奥思想的简练的抒情诗。国文文学始于乡歌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抒情诗较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态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自从时调取代乡歌之后,文学形态的体系发生了变化。乡歌时代抒情诗独占鳌头,时调则不同,它是与歌辞并存的。时调为抒情诗,而歌辞则可以说是教述诗。抒情以概括为牲,叙述则以夸张为特点。如果说抒情是世界的自我化,那么教述可以说是自我的世界化。^①除了歌辞以外,景几体歌、乐章等也是教述诗。随着“训民正音”的创制,国文文学的扩大成为可能,长篇教述诗才得以进入记录文学领域。

教述很早就存在于文学世界里。汉文学的“文”几乎都是教述。不过,国文文学中出现多种形态的教述诗的时候,汉文学中也出现了借用叙事手法的作品,但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它只是供人们消遣的教述文学形态——假传和梦游录。教述在国文文学与汉文学两方面都变得非常活跃,从而改变了原有的文学格局。这样,结束了中世纪前期的文学时代,开始了中世纪后期的文学时代。

^① 韩国文学的这种分类方法在赵东一的《韩国文学的分类理论》(汉城,集文堂,1989)中有详细论述。

到了国文文学能够和汉文学平起平坐、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时期,小说创作变得非常活跃,出现了抒情、教述和叙事三足鼎立的局面。小说中既有汉文小说,也有国文小说。两者相互竞争,相互刺激。国文小说的发展使国文文学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作品的数量与容量也大幅度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抒情领域里产生了时调的变种——辞说时调,而作为教述诗的歌辞也变得更加长篇化,从而能够更详细地反映现实生活。这说明,发生在叙事文学中的变化,同样也发生在其他文学领域里。

口碑文学使得民谣和说话得到充分的再创造,以叙事巫歌为基础产生了新的文学形态——“盘骚里”(说唱文学——译者注),它在创新叙事文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盘骚里”把英雄叙事诗改变为凡人叙事诗,并以兼容教训和讽刺的复合结构来收容当时社会的争论焦点。由于它的音乐和表演方式与众不同,因而在当时非常盛行。此外,具有悠久历史的农村假面舞也发展为规模更大、社会批判倾向更强烈的都市假面舞。如果把口碑文学也考虑在内的话,可以说此时进入了抒情、教述、叙事以及戏曲四种基本文学形态互相竞争的时代。

近代文学开始以后,在文学形态体系中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教述的没落。随着汉文学的衰退,教述的巨大领域也渐渐消失了,近代国文文学认为,教述领域中只有散文里的随笔属于文学。时调和歌辞的命运各异,时调力图复兴,而歌辞就连作为旧时代文学的残存形态存在下去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这标志着教述的没落。与此相反,戏曲进入了记录文学领域,而近代文学则包括了抒情、叙事以及戏曲这三种基本文学样式。

韩国的传统和西方的影响对韩国近代文学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是一个由来已久、争论不休的问题,它在抒情、叙事和戏曲三个领域中的表现各不相同。在小说方面,古典小说经过发展直接过渡到近代小说。语言的使用、事件的展开、与读者关系的设定等方

面可以说没有脱节。抒情诗在内在情韵上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而在外在形式上较突出地表现出效仿西方的诗歌形式,力图创造一种自由诗。戏曲的情况与上述两者不同,它移植了一种与只作为口碑文学继承下来的假面舞完全不同的、既是记录性的又是个体性的戏曲形式。

文学形态体系之所以发生上述变化,是因为文学创作主体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主体是指创造和接受文学的阶层。不同的文学创作主体创造和接受着不同的文学,他们共同存在,相互竞争。社会的统治阶层、反对派以及被统治阶层都属于文学创作主体,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互相竞争。我们前面已经以语言和文学形态为标准考察了文学的发展历史,但这还不够,因为文学史又是一个文学创作主体之间为了争夺主动权而展开竞争的历史。只有把这一层也考虑进来,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学的发展历史。这样就有必要考察作为文学创作主体中一员的代表——作家。

古代的建国叙事诗是由征服战争的主角——军事贵族自己创作并继承下来的。那时,政治统治者既主管宗教又直接掌管文学与艺术。统治阶级认为建国始祖为上帝之子,国家的统治者与上帝是一脉相承的,并以此来标榜他们自己理应具有绝对的优越感。而这种古代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建国叙事诗中找到了最适合的表现方式。

到了中世纪,要吸收汉文学、创作出格调高昂的抒情诗,就需要设立一个掌管文学的专门机构。在新罗,“六头品”就担负了这种任务。“六头品”是下级贵族,他们无法达到最高统治阶层——“真骨”的地位。他们一方面凭借读书写字的能力在治理国家方面发挥实际作用,另一方面又在汉文学与佛教两方面追求中世纪的普遍主义理想,并因此陷入了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在新罗怀才不遇而不得不远赴唐朝的崔致远就是其典型代表。

到了10世纪,即高丽取代新罗之后,中世纪的文学创作主体

摆脱了下级贵族的身分,登上了统治地位,并实施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汉文学创作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实施,只是少数几大门阀霸占统治地位,享受他们的既得权益。一般把高丽前期的统治阶层叫做门阀贵族,从当时最活跃的金富轼的文学创作和历史叙述中能够明确地发现这种门阀贵族意识。

15世纪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武臣之乱,接着蒙古族的新的统治势力取代长期垄断统治权力的门阀贵族登上了统治舞台。但他们没有树立统治理念,只是一味地施行暴政。这一时期,一直受门阀贵族压抑的地方乡吏中精通汉文学的实力派人士开始跻身于中央政界,成长为新兴士大夫。他们与名门世族相对抗,要求进行社会改革。韩国文学发端于中世纪后期。中世纪后期文学的先驱李奎报开创了爱民爱族的文学之先河。到了安轴、李穡时代,文学方向的转换变得更加明确,并通过景几体歌和时调的创作,实现了国文诗歌的革新。

士大夫掌握政权以后建立了朝鲜王朝。他们在政治上试图实现新儒教的理想。这就导致了15世纪以后文学上的对立与冲突。也就是说,虽然以往都认为“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并把这一点作为共同的纲领,但是以徐居正为首的既得权益阶层的守旧派更加重视“文”,而以李滉为理论带头人的批判势力——“士林派”却认为致力于“道”才更为重要。另外,以金时习为代表的在野人士,则抛弃作为士大夫的特权和优越感,与民众打成一片,创作了反对朝鲜王朝统治秩序的文学。

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时期——16世纪,统治阶级尽管强化了捍卫新儒学理念和汉文学规范的意识,但仍然无法阻挡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士大夫文学内部的分化逐渐加大,导致了其主导权的动摇。对现行统治体制的矛盾深感不满的有识之士,尤其是以朴趾源、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文人以他们对社会的批判